

# 四十年,个体经验与时代表达

最近数年,一大批1980年前后登上诗坛的诗人迎来了“四十年”大关,出版界也推出多种《四十年诗选》,评论家霍俊明专门撰写了长文《“四十年诗选”:历史正典、同时代人与未来感——兼谈选本文化以及“第三代”》刊发于《文艺报》“凤凰书评”专刊。围绕诗歌创作“四十年”话题,尤其是个体经验与时代发展,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著名诗人尚仲敏展开对谈。

对  
话

1

李黎:尚总你好!很高兴跟你聊诗歌,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,你目前的身份是企业家。这个身份似乎和诗人身份格格不入,但细想也容易理解,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人写诗,随后大家都要去各行各业做更务实的事情。从投身诗歌,到突然离开,再到最近的回归,你和诗歌的关系可谓分分合合,那么你认为人与诗歌,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关系?

尚仲敏:诗歌与人的关系应该这样撇清:第一,诗歌不是一个诗人的全部,人的一生太漫长了,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存在,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写小说可以作为一种职业,你可以计划一篇小说,但你无法计划一首诗,所以,写诗不能成为一种职业。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,唯有诗歌是无法预知和谋划的,它只能在一个神秘的稀有的时刻来到笔端,也只有在这一刻诗人才是所谓的诗人,其他时候都不是。第二,诗歌不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,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那么多优秀的诗人突然离开诗歌,从事别的行业或下海从商,就是因为诗歌养活不了诗人自己,更养活不了诗人一家。那些把诗歌当成生活方式,或者从外表上看更像诗人的人,最后的结局都很惨。我大学毕业的那几年,对诗歌几乎陷入痴迷,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立足。我逐渐醒悟到,这样下去一方面生活无以为继。另一方面,执意写诗,也不一定写得好。我决定离开诗歌一段时间。大概有二十年时间,我看起来和诗歌完全绝缘了,甚至听到别人谈诗,我会走得远远的。由于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,或者说,身上已经有了诗歌的基因,我会把握极其有限的时间,在繁杂的事务之余,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诗人的诗。激情燃烧时,偶尔也写一点,一年也就二三十首吧。我有两个朋友圈,一个是诗歌方面的,另一个是其他的。在现实生活中,我把这两方面分得很清。我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内心深处和诗人的诗,不让太多无关的人进入其中;同时,其他方面的朋友,我也会真诚地和他们相处。其实,我生意上的大多数合作伙伴,都不知道我还会写诗什么的。

李黎:1985年,你成立了“大学生诗派”,创办了《大学生诗报》,从最初就秉持一种特别“非非”的,今天看来又很“废话”的创作理念。我很好奇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怎么形成这个观念的?当时你的诗歌阅读、“诗歌教育”是一种什么状况?

尚仲敏:1985年,我在重庆大学读书,创办了面向全国的《大学生诗报》,提出了“大学生诗派”的理论主张。当时的诗坛是朦胧诗的天下,朦胧诗的高大上,朦胧诗的英雄主义,朦胧诗的艰涩难懂。作为朦胧诗的对立面,以口语化和叙述凡人生活为特点的“大学生诗派”应运而生。1986年,我大学毕业到成都工作,周伦佑、蓝马、杨黎筹划“非非主义”诗歌流派,他们拉我入伙,我就参与了。“非非主义”的核心主张是反崇高、反修辞、反语义、反价值,这与我一贯之的诗歌主张不谋而合。后来杨黎提出并实践了废话理论,从诗歌语言革命来看,废话的先锋性和价值观,我深以为然。大学生诗派、非非主义、废话,其核心是始终如一的,就是语言上的反修辞,价值观上的反意义。

李黎:1988年,诗人海子在你的宿舍里跟你长谈了七八天,然后离开,你写了一首《告别》。这首诗被解读为既是朋友之间的告别,更是两种诗歌美学的告别,即你所秉持的口语的、现实的和即时的诗歌,和海子那种史诗和神秘感的告别。今天看来,经历了“第三代”诗歌洗礼,海子还是相信史诗,算不算一种异类或者执着?你怎么看待他的写作?

尚仲敏:海子1988年秋天来成都,当时我在一所大专学校教书,有一间宿舍,他就在我那里住下来了。那个年代,朋友往来基本上都住在对方家里,一是旅馆很少,二是没钱。海子头发很长,穿着一身牛仔服,外表看起来时尚而叛逆,但骨子里面却是一个内向甚至羞怯的人。我们是同龄人,也是好朋友,我非常坦诚地接待了他。前后有一个礼拜左右,我们朝夕相处,喝酒谈诗,他酒量不大,我喝的要多些。他更多地谈到了他的长诗,谈到史诗和寻根的宏大写作,他把诗歌置于人类命运和死亡的高度,并为此孤注一掷,走火入魔。我和他在诗歌观念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相比于他的长诗,我更喜欢他的短诗。我始终认为,诗歌应该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;诗歌除了语言不应该再承载别的什么;诗歌如果要怎么样的话,那就是从凡人的生活开始,到凡人的生活结束,要接地气、说人话。争论归争论,我们仍然是朋友,相处的几天还算愉快。

他走后,我给他写了一首诗,标题是《告别》:  
过往年代的大师  
那些美丽的名字和语句  
深入人心,势不可挡  
但这一切多么徒劳  
我已上当受骗  
后面的人还将继续

生命琐碎,诗歌虚假无力  
我们痛悔的事物日新月异  
看一看眼前吧  
歌唱或者沉默  
这一切多么徒劳

2

李黎:几年前开始,你支持南京的《青春》杂志做了一个面向大学生的诗歌栏目,这是不是一种怀旧和反馈?今天的大学生诗歌和你们当年相比,不变的和变化的都有什么?

尚仲敏: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,大学四年是最适合写诗的四年,在我们那个年代,你不读诗、不写诗,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读大学。李檀担任《青春》杂志主编后,一直注重大学生诗歌,并开辟了相关栏目和举办了一些评奖活动。我的支持很有限,要回归和弘扬大学生诗歌精神,需要大学生的自觉和全社会的关注支持。今天的大学校园诗歌,和八十年代相比,诗歌没有变,诗歌一直在,但参与其中的人数已经断崖式下降了。这是因为大学生的关注点和娱乐方式变了。

李黎:你是为了诗歌主动申请从北京回到成都的?成都作为八十年代的汉语诗歌重镇已经广为人知,是名副其实的“诗歌之城”,群星闪耀,并且不断把周围的人吸引过来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级诗歌事件的?传统、方言和世俗生活等,或者说诗人和观念,哪些因素作用最大?

尚仲敏: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,很快调回成都。成都的诗歌氛围在当时是最火的。一是群体众多,二是群星荟萃:杨黎、何小竹、吉木狼格、柏桦、李亚伟、翟永明、万夏、石光华、宋炜、刘太亨、孙文波等等,这些名字至今仍在中国诗坛滔滔作响、回声不绝。成都作为诗歌之城,在八十年代几乎占据了全国诗坛的半壁江山。如果从深层意义上探究,造成这种现象级诗歌事件的原因,我认为和地域、气候、风土人情、地方方言、生活习惯,甚至和风水都有或多或少的微妙关系。或者,和成都人普遍隐忍、阴柔、细腻、敏感的性格有关。

些人和事,能否借此机会再进行一次回顾?

尚仲敏:“大学生诗派”是作为朦胧诗的对立面提出的。在1983年左右,一类和朦胧诗完全相反的诗,从全国各个大学悄悄涌现。可以说,进入八十年代,没有哪一所大学没有诗社,没有哪一个诗社不创办油印诗刊。这些油印诗刊经过相互邮寄和相互阅读,形成了巨大合力。以于坚、韩东为代表,南方有张小波、宋琳、梁晓明、余刚,北方有封新城、非可、叶舟、潘洗尘、苏历铭等等,很奇怪,他们的诗大多数都和主流诗歌朦胧诗格格不入。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加以归纳、研判和梳理,最后发现,虽然每个个体都栩栩如生、各不相同,但他们在语言方式上的简单直接,在内容选材上的凡人化、世俗化,对现实意义的荒诞、反讽、自嘲、调侃式表达,是共同的,呈现出了一个诗派的特色。加之他们的身份都是在校大学生,就干脆取名“大学生诗派”。正如你所言,这个诗派有特定人群和时效性局限,它显然不是一个持久恒远的流派,它的魅力和作用也许正在于它的短暂。就像我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所写,它就像一枚炮弹,只追求那美丽的轰隆一响。

李黎:1980年生于南京郊区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群星闪耀时》。

尚仲敏:1980年生于南京郊区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群星闪耀时》。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区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群星闪耀时》。



尚仲敏

上世纪80年代先后发表《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》《反对现代派》等重要诗论,率先提出“口语诗”写作,是“第三代诗歌运动”的主要批评家和理论家;同期写作的诗歌作品《卡尔·马克思》《桥牌名将邓小平》《祖国》等被认为是“第三代诗歌”的重要代表作之一。出版诗集《始终如一》《尚仲敏诗选》。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。

李黎:南京和成都一样,八十年代也是诗歌重镇,而我个人有一个极端的观点,那就是整个八十年代,全国所有的城市全部都是诗歌重镇,所有的县城也是。今天我们回顾这些城市的时候,更多的还是看当时当地的重要诗人,以及这个城市的诗人是否熬过了诗歌不景气的年月坚守到如今,以及这个城市在今天的整体文化话语权。带入这些标准后,各个城市在诗歌史上的位置会出现一个排序。但当年在每个人内心闪耀的诗歌之光,应该不分东西南北中的。不知道这个看法是否成立?

尚仲敏:我同意你的看法,不管是成都、南京,还是一些别的城市,甚至一些小县城,在八十年代,都是诗歌重镇。那时因为那些地方居住着一些重要的优秀诗人。随着诗人的变迁,各个城市在诗歌史上的排名肯定会出现新的排序。不过这个排序并不重要,感谢这个时代,给我们贡献了为数不多的堪称伟大的诗人的持续探索,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闪闪发光并照亮人们心灵所沉浸的茫茫黑夜。

李黎:你其实是在诗坛消失了近二十年,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,比如著名的丁当。随着网络对诗歌传播的极大刺激,你也复出了,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。抛开一个时代的集体选择之外,你突然开始写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,再突然消失于诗坛,再到最近几年的复出,有没有具体的、个人的因素在里面?有哪些故交让你难忘?

尚仲敏:我在九十年代初辞去公职、下海从商,经历可谓云诡波谲、一言难尽。大概有二十年,为了不使诗歌受到损害,我选择远离。诗歌是一项安静的事业,需要全神贯注。静不下心来的时候,最好别写。江山易改、本性难移,进入二十一世纪,互联网的兴起,特别是有了微信和自媒体,写诗突然变得容易起来。在茶余饭后,在等人的间隙,只要愿意,都可以拿出手机写诗。写着写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
丁当的情况和我不同,首先,他是“第三代”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;其次,他的工作和事务繁忙复杂程度非我们所能想象,他至今不写现代诗是诗歌的巨大损失(逢年过节,我会收到他偶尔为之的简短古体诗)。除了丁当,类似情况还有北京的张小波、万夏。但沈浩波是个特例,他把公司做得很大,又能坚持写诗,而且写得很多,有机会我要问问他,是怎么做到的。

李黎:最近几年开始,多位诗人纷纷进入了诗歌写作四十年的阶段,关于四十年的精选集也不断问世,可以罗列出个特别长的名单,而标准略放宽的话,这个名单基本就是半部八十年代诗歌史了。你前几年也已经出版了《尚仲敏诗选》,收录了从1980年以来的诗歌。回顾四十年的诗歌写作,你能否进行一次总结和梳理?

尚仲敏:这么多年来,我只出版过一本有正规书号的诗集《尚仲敏诗选》,是潘洗尘帮我出的。杨黎的橡皮给我做过一本诗集《始终如一》,没有书号,算是藏品吧,不过我同样看重和高兴。至于我的写作,我想还是留给我的朋友们去梳理和评说吧。